

蒙古历史文化文库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

M E N G G U L I S H I W E N H U A W E N K U

〔匈〕П·卡拉 著

范丽君 译

乔吉 审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历史文化文库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

[匈] 兀·卡拉 著

范丽君 译

乔吉 审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匈]J·卡拉著;范丽君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204-07526-9

I. 蒙… II. ①卡…②范… III. ①蒙古族—文字—历史②蒙古族—图书史 IV. ①H212.2②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3567 号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

作 者 [匈] J·卡拉

译 者 范丽君

审 订 者 乔 吉

责任编辑 王赤华 斯琴

装帧设计 徐敬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88 千

印 张 8.25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联系电话 0471-6292212 6292151

ISBN 7-204-07526-9/K·457

定价:15.00 元

出版说明

蒙古民族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民族。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历史上蒙古民族的活动有着程度不同、性质各异的联系；今天，蒙古族分布在数个国家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大多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方。她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引起了许多国家学术研究者对其历史、文化等的浓厚兴趣。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 50 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蒙古学研究，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及学术专著，并形成了几个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

蒙古学研究无论是在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中，还是在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待于通过蒙古学的深入研究得以解决，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同样如此。蒙古学研究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人

文科学研究的发展繁荣程度。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蒙古、日本、欧美等诸多国家蒙古学研究开展得比较活跃,出现了许多学术价值高、有见地,对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的中国的学术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的论著。为了向我国学界介绍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特编辑出版《蒙古历史文化文库》。期望本文库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扩展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并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

、本文库重点翻译介绍国外蒙古学学术著作,凡属蒙古学方面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文献研究和资料汇编等有较高学术水平又对我国学界有较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拟不定期陆续出版。

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心之一的中国内蒙古,作为蒙古学研究出版中心之一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库不仅具有上述作用,同时传承与弘扬蒙古民族文化及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和人民所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译者序言

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英文转写为 Kara Gyorgy)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蒙古学家之一。国际蒙古学同行们根据其匈牙利语的名字,用蒙古语亲切地称呼其为哈拉道尔吉(Qaradorji),于是这位聪明而博学的匈牙利人以蒙古语名字——哈拉道尔吉而闻名于世。卡拉·捷尔吉教授是国际蒙古学界和突厥学界非常注重的一个人物。他于1935年生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布达佩斯市。1953年至1958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从1959年起在布达佩斯大学语文系任教,期间师从著名蒙古学家和东方学一代宗师L.李盖堤(L. Ligeti)及U.聂美特(U. Nemeta)等人,从事蒙古书面语言、阿尔泰语言和西藏语言等为主的东方学研究。1975年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他曾任匈牙利大学亚洲研究室主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学研究部主任、国际蒙古学家联合会副秘书长等职。蒙古学方面的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蒙古弹唱诗人的诗歌》(1970年),《简明蒙古文学词典》(1972年),《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1972年),《维摩诘经》(1982年)等,此外还撰写了有关蒙古学和突厥学研究方面的论文60余篇。

卡拉·捷尔吉教授以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文字而闻名于学界。他除了精通其母语匈牙利语以外,还通晓英、俄、德、法等语言文字,同时也熟练地掌握了有关东方学的蒙、藏、满、维、汉等文字以

及古代突厥文和梵文等文字。在当今国际蒙古学界,掌握如此众多语言的学者实为罕见。

卡拉·捷尔吉教授不只是著名的蒙古学家,也是颇有名望的突厥学家。他曾与德国学者 P. 茨美(P. Zieme)合作,在《柏林吐鲁番文献丛书》中刊布了三种回鹘文文献。前两种是中世纪回鹘语“坦陀罗”(密宗)和喇嘛教文献,这是完全由藏文翻译过来的,例如有萨迦班迪达写的有关师徒关系的作品。后一种是 14 世纪翻译的藏语“坦陀罗”文献,其中之一是卡拉·捷尔吉教授发现的 12 世纪的密宗佛教文献。1976 年他刊布了《敦煌回鹘文题记》,后来又刊布了《斯坦因敦煌回鹘文文献》中的几部重要文献。

在卡拉·捷尔吉教授众多的蒙古学著作中,我们现在译成汉文的《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蒙古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代表作。此书是由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所编《东方各国文化丛书》中的一本,1972 年由《东方文献总编辑部》以俄文出版。此书刚一出版,便轰动了国际蒙古学界,各国学者纷纷评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值此《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一书汉译文在我国出版之际,译者不揣学识谫陋,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主要观点作一简介,以使读者有个梗概性了解。

这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蒙古文字的历史概况”,第二部分为“蒙古人的书籍”,即对蒙古文献的全面论述。

关于蒙古文字的若干问题已在一般蒙古语言学著作和专题著作中有所阐述,但是,将蒙古人的文字历史和文献融为一体来进行描述的科学著作尚未问世。而蒙古文字的历史演变和各种古老文献的系统研究,对于再现蒙古人的文化发展史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因此,匈牙利著名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这部著作的问世,就不能不受到学界的关注。

我们知道,蒙古人的最初文献和书籍的产生及其发展是与蒙

古人最初所用和创制的文字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这部书中首先用很大篇幅来论述蒙古人历史上所用文字系统演变及其历史。卡拉·捷尔吉教授首先指出,特定的历史环境创造了特定的文字,现今蒙古语族使用的文字体系产生于13世纪,其文字历史与其政治文化历史相辅相成。卡拉·捷尔吉教授将蒙古人的文字历史分作三个时期:一,产生时期。这个时期,蒙古人在政治历史上是国家权力形成阶段,文化史上是与汉文化包括女真、唐兀惕、突厥和吐蕃的影响汇流和蒙古人开始接触佛教的阶段,在语言史上是中世纪蒙古语,即标准语言形成阶段。二,复兴时期。这个时期,蒙古人在政治历史上是16—17世纪,蒙古人为重新统一而斗争阶段,在文化史上是佛教和西藏文化影响加强的阶段,在语言史上是由古典语言过渡及标准方言形成阶段。三,创立现代文字时期。这个时期,蒙古人在政治历史上是蒙古语族在社会主义民族的合作下走上复兴和发展的阶段,在文化史上是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阶段,在语言史上是现代标准语言形成的阶段。作者依据上述论点,对蒙古文字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研究。

卡拉·捷尔吉教授明确地指出,据汉文文献记载,在蒙古语族中居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北部诸部落,即成吉思汗统治的这些部落使用“无文字”的语言,而南部兴安岭一带的其他部落独立的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随后创制了文字。作者将拓跋人(古代突厥《阙特勤碑》(732年立)文中所称之 *tawGac* 或 *tabghach*——译者)以及契丹人和吐欲浑人等归属到南部兴安岭一带的一支。作者指出,据汉文文献记载拓跋王朝有自己的文字,拓跋人的语言是“古蒙古语中的鲜卑方言”;契丹人“毫无疑问是鲜卑南兴安岭一支操蒙古语的部落”,契丹人于920年创制“契丹大字”,925年创制“契丹小字”;吐欲浑人是“鲜卑蒙古语民众”,他们的文字与拓跋王朝时期的文字极其相似。

关于回鹘蒙古文字,作者指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就已经

借用了回鹘文字,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无论是从字形,还是其内部的特点,两者都具有共同特点。卡拉·捷尔吉教授认为,蒙古人从一开始就按蒙古语拼写文字,而不是以克烈语或乃蛮语等拼写,是从乃蛮或克烈部落借用了现成的书面语言文字。同时卡拉·捷尔吉教授还注意到,“所有材料中有一点尚未充分证实,即塔塔统阿是蒙古文字的创造者的说法。目前我们确实不清楚他当时用何种语言与蒙古人交谈,乃蛮人最早掌握的是突厥语还是蒙古语?交流时采用的是哪种语言?”作者还通过对乃蛮部落的蒙古语名称“乃蛮”(意为八,大概是八个部落的联盟)和乃蛮人所用突厥语名字等现象的研究,指出“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民族之间联系的广泛程度,而不能证明这个民族使用什么语言”。

卡拉·捷尔吉教授对于“蒙古建国之前回鹘蒙古文书面文字已经产生”的说法也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当时书面语与13世纪的活的方言差别很大,回鹘蒙古文不具备较早的书面语体系特征。而这一说法是依据13世纪后半叶较晚的资料,而没有根据当时比较典型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这样就能从理论上推翻这种说法。

我们从卡拉·捷尔吉教授的这部书中不仅了解到回鹘蒙古文的产生历史及其背景,还能了解到这种文字流行于“大蒙古国”所属的各地区:如金帐汗国的撒莱城,伊朗的蒙古黄金家族领地帖必力思,察合台汗国的首都别失八里城,窝阔台汗曾接见诸国使臣的哈喇和林城等等。作者指出,蒙古书面文字得以迅速发展还是忽必烈朝政以后。当时,回鹘蒙古文不仅用于朝廷,还用于佛经的翻译。作者搜集了很多有关13—14世纪蒙古人用回鹘蒙古文翻译佛经的有价值的资料。卡拉·捷尔吉教授认为,佛经翻译作品中反映了中世纪蒙古标准语的特点。其中于1269年前由索南加刺译成蒙古文的萨迦班迪达的名著《萨迦格言》“是中世纪蒙古标准语重要文献之一”。

他谈到另一位著名佛经翻译家、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时提出了

与前人研究有所不同的见解。前人的普遍观点认为他是藏族人。卡拉·捷尔吉教授则认为,捌思吉斡节儿的突出才华表现在蒙古语言方面,从他于1312年翻译和注释的《入菩提道行径》,以及他的诗一般优美的跋语等来看很像是蒙古人。然而依据有些文献资料的记载,他是回鹘人。作者指出,“假如我们赞同这一点,就能够解决蒙古语中渗透大量回鹘语的问题”。作者还根据中世纪的回鹘文、波斯文、汉文和蒙古文等资料,向读者讲述了在中世纪蒙古人的宫廷和寺院中除了蒙古人以外还有许多非蒙古人,如回鹘人、汉人、波斯人、女真人和西藏人的高明之士,笔帖赤(司书)和翻译家的生平和活动。作者指出,用回鹘蒙古文撰写的像已经亡失的《金册》或《蒙古秘史》等独具一格的蒙古文著作大概就是此时产生的。在回鹘蒙古文的迅速发展影响下,13—14世纪间蒙古人中出现了不少学者和精通多种语言的高明学士,如在伊儿汗国被誉为贤君的合赞汗(1295—1304年),他除了其母语蒙古语以外至少还懂七种语言。这一切对读者来说颇有趣味。

1269年秋,遵循大蒙古国第五代皇帝忽必烈的圣旨,西藏的八思巴喇嘛创制了“蒙古新字”,即学界所称之“方体字”或“八思巴字”。卡拉·捷尔吉教授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与八思巴字有关的语言学问题、历史背景以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遗存的翔实情况。而后指出,八思巴喇嘛创制的文字与回鹘蒙古文比较,确实消除了回鹘蒙古文符号的多音现象,同时借助补充字母和字母组合来准确转写汉语的发音,促进了汉语转写的发展,成为蒙古文字史上第一套语音准确的文字。然而到15世纪时八思巴字被蒙古人遗忘。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一书还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16—18世纪蒙古文化的复兴问题。作者探讨这个问题时首先论述了当时蒙古地区的历史背景:随着元朝的灭亡出现了蒙古与明朝的连年战争;为统一蒙古而发生的不休的内战;与北亚新兴势力——满洲

人的战争。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蒙古人迫切需要一种高于原有萨满信仰的新宗教。于是蒙古人再一次与西藏佛教发生了联系。看来当时蒙古人还没有忘记在元朝时期成为国教的西藏佛教。16世纪后半叶,西藏佛教的一支格鲁派急速传入蒙古地区。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将佛教经典译成蒙古文的工作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们应当指出,作者在本书这一部分中也搜集了大量有关蒙古文佛教经典译本和史料,论述了蒙古人的佛经翻译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展的具体情况。在这一时期,蒙古人的出版印刷业也得到了新发展,其中除宗教文献外,还有不少世俗内容的著作问世。例如,宗教方面,在漠南蒙古地区重新出现了《金光明经》的印刷本(作者认为此经刊行年代为1587年,其准确年代应该是丁丑年即1577年——译者);1629年蒙古诸部译师们编译了108卷《甘珠尔经》;1749年,将《甘珠尔经》的通经疏义文大合集《丹珠尔经》226卷之巨译成蒙古文。此间除了印刷多卷佛教经典以外,还印刷刊行了200余部有关语言学、文字学、天文、历法、文学、医学和名人传记等著作。除了北京以外,蒙古地区的很多寺庙也创办了印刷机构,这些印刷机构影响了漠北蒙古和贝加尔湖地区及西蒙古卫拉特地区。

卡拉·捷尔吉教授指出,16—18世纪是蒙古语言文字的复兴时期,也是古典语言形成时期。作者在首次论述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以大量流传至今的重要史料和鲜为人知的文献为基础,深入浅出,全面、详尽地显现出了13—18世纪回鹘蒙古文的发展进程。正如卡拉·捷尔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13—15世纪的手抄文献、印刷文献及石刻文献中的语言是用回鹘字,或是用八思巴字,甚至也用阿拉伯字拼写。这是中世纪蒙古语及其方言存在的具体反映,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成为标准语的回鹘蒙古文变成了较为保守的书面语形式。对这种书面语来讲,这两百年也是一个过渡时期,陈旧的拼写规则并未完全消失,新的规则开始出现;到了16—18世

纪,该标准语书面形式,无论其字形还是语法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18世纪时新旧规则体系完全融合,形成最终古典书面语。陈旧的拼写形式和语法形式被摒弃,新正字法规则制定出来,外来的宗教名词术语等丰富了。具体来说,回鹘蒙古文无法做到准确翻译和拼写印度、西藏传来的宗教和哲学术语。针对这种情况,1587年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阿尤喜固什创制了“阿里嘎礼”音译字母。作者对这种音译字母也进行了详细探讨,并指出阿尤喜固什在三世达赖喇嘛的劝戒下首先在察哈尔地区使用了自己创制的音译字母,还翻译了《五守护神大乘经》(该书至今仍被保存)。阿尤喜固什的音译字母成为16世纪末出现的拼写规则的重要依据。

我们所叙述的这个时期,即16—18世纪,尽管古典语言有其一定的书写规则,但是各个地区的方言在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以及各种文件中比比出现。在蒙古诸部被称为西蒙古的卫拉特人使用着与东部蒙古人有显著区别的独特方言。鼠年即1648年,崇尚西藏文化的著名翻译家和语言学家,被尊称为兰占巴·札雅班迪达·呼图克图(1599—1662年)创制了“托忒蒙古文”字。卡拉·捷尔吉教授在对札雅班迪达的生平及其创制的文字加以论述的过程中,对其所创制的文字也作了详细研究。他指出,札雅班迪达在回鹘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体系。从实践上消除了一字多义的情况,使蒙古书面语与当时的口语形式极为接近,其文字改革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确立了书写单位的单一性和回鹘蒙古文变音符号的单一性;创立了新的变音符号和新的字母;形成了正字正音规则;解决了元音转写问题,明确了清浊音的差别。”他同时还认为,“托忒蒙古文”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已广泛使用,这种文字的创制并不是单纯为了卫拉特人,而是想创立一个全体蒙古人共同使用的新的书面文字。

卡拉·捷尔吉教授除了“托忒蒙古文”以外还谈到了于1686年

由喀尔喀人、一世哲布尊丹巴创制的“索永布字”。作者认为,“索永布字”尽管很漂亮,但与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相比,就显得很不灵巧,因此只能将其用作花体字来运用,偶尔也起到一些装饰性作用。作者还指出,该文字虽然在喀尔喀人中没有传播开,但它不仅成为一种可欣赏的字体,同时也成为文字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卡拉·捷尔吉教授还简要叙述了布里亚特学者阿旺·道尔吉的生平及其创制的文字(学术界一般称其为 *vagindara* 字——译者)。作者指出,阿旺·道尔吉于 1905 年所创制的“布里亚特新字是塞姆字母由西向东方游历的终点站”。这一套书面文字是在蒙古语,准确讲是在卫拉特方言的基础上创制的。这套字母废除了蒙古文字系统中所有变体形式,消除了同形异义情况,实际上等于没有了词位上的变体符号,借助变音符号才能分清元音长度和辅音软化现象。该文字在后贝加尔地区使用几年后便无声无息了。

该书的第二部分《蒙古人的书籍》,即蒙古文献部分,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蒙古人将“书籍”称为“*nom*”。作者指出,这个词经历了从地中海到中央沙海的漫长跨游之后成为蒙古语的通用词汇。该词源于古希腊语,词根意义是“规律、规则”,例如在俄语中的 *astranom*, *gastranom* 等词中含有 *nom* 一词。接着作者详细论述了刊本出现之前蒙古人的古代文字遗存。卡拉·捷尔吉教授将这些遗存通称为“手抄书籍”(手抄文献——译者),并将这些手抄文献分为铭文、公文、书信等。铭文的内容包括官方的、私人的、世俗的和佛教的等方面。官方铭文中有关墓志铭文、史学铭文、寺院庙宇铭文、金石圣旨、令旨和懿旨牌铭文、刻版铭文、印章、图章铭文等。作者将这些铭文产生的年代、内容、装饰形式及其文字特点等逐一进行了详细描述,可称为一部铭文编年史。作者关于公文、书信和文件的内容分为官方文件、个人信件、外交信函、法律和经济公文等方面。从这些信函,尤其是外交信函的研

究中作者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他写道:“根据明廷(1368—1644年)蒙汉两种文字致伊朗鲁里斯坦地区长官的信函内容和数量,我们推测,在明初的百余年里,蒙古语曾是中国和西方某些国家进行交涉的外交语言。”毫无疑问,书籍的前身就是上述这些“手抄书籍”,在“手抄书籍”的基础上出现了印刷书籍。在这里作者正确指出,“在新的回鹘蒙古文书面文字使用的最初一百年,蒙古人先于欧洲人而懂得了印刷技术,但手抄书籍仍占重要位置”。作者将这些手抄文献进行描述后对17—18世纪的蒙古文手抄本也作了探讨:即蒙古人所用的书写工具和纸张的来历及墨汁颜料的制,金帐汗国的桦树皮手抄本等等都在作者的笔下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我们知道,蒙古人的印刷技术大概源于汉人。13世纪后半叶蒙古人才了解汉人的雕版术。作者在本章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蒙古人的印刷书籍即刊本:雕版技术及其整个操作过程;书籍的式样;书籍的装帧;书籍的名称和特殊的“跋语”;多种文体的书籍;收藏家、收藏馆、印书馆等等。关于蒙古人书籍的内容,作者写到,“就书籍内容而言,蒙古古代书籍多种多样,有截然不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本民族传统、文化和翻译文学,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多数是喇嘛教文献),艺术性文学和专业文学都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至今为止,对蒙古人书籍的研究著作几乎不见。正如苏联著名蒙古学家 H. И. 蒙库耶夫所指出的那样,“卡拉·捷尔吉教授以先于所有学术著作而头一个对蒙古人的书籍,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蒙古人的书籍做出全面描述”的学者而载入史册。

总之,卡拉·捷尔吉教授——世界蒙古学学者们亲切称呼的哈拉道尔吉教授——的《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蒙古学名著,是研究蒙古学必不可缺的参考书。这部著作反映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引证广博、论证严密的特点取胜,自成一

家之言。卡拉·捷尔吉教授的这部著作言之有据,其证据除了其他研究家们刊布的诸种文字资料以外,还有蒙古文馆藏方面占据世界一流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院蒙文部馆藏物^①,其中包括大量文件、档案、罕见的原始手抄本和各种刊本等。

卡拉·捷尔吉教授的这部著作附有 560 条注释和 26 幅图表,还有不少附有文字说明的插图。这些注文,具有语言学、史科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宗教学等综合性学科性质,它对专业人员来说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真知灼见。书中的插图和书后的图表是蒙古文字和书籍的历史性纪录的直观反映,都极为珍贵。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这部著作中,卡拉·捷尔吉教授大量使用了古蒙古文、回鹘文、藏文、梵文和佛教著作及古蒙古文著作中的词汇和术语,而且经常用原文词汇来注明这些术语。因此我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然而,欣幸的是承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乔吉教授的热情帮助,使全书译注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乔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历史文献专家,他不仅精通古蒙古文文献,而且通晓蒙古文佛教文献及其有关的藏、梵等专业名词术语。同时,他和卡拉·捷尔吉教授是多年的朋友,又是同行,彼此有着深厚的交情。多年来他一直想翻译卡拉·捷尔吉教授的这部名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98 年夏,乔吉教授将翻译此书的重任交给我,同时他还表示要亲自审订译文,我欣然接受。

乔吉教授是内行,通晓俄文,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这部著作的中文版问世之际,我谨向乔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翻译名人著作,实在是一件难度极大的苦差事,就我个人体会

① 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院——译者。

而言,永远不会使自己和读者,尤其是内行里手感到满意。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译本中错误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万望大家不吝指教!

范丽君

2003年孟夏

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研究所

序 言

13 世纪,勇猛善骑的蒙古族人民驰骋在从黄海到亚德里亚海这片欧亚大陆上。蒙古文字也就诞生在这漂泊动荡的时代,时至今日已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有了国家及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就必须创立自己的文字,培养自己的文化人,这样才能与周围的民众交流,融合关系。有了书面文字,必定有书籍文献,由此我们了解中央亚洲、中国、印度的文化,游牧民族和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的发展,回鹘文及吐蕃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

蒙古民族的文字、文献书籍产生的历史比其国家产生的历史悠长。目前保留下来的有皇帝的诏书、信件、公文,例如,有关免除寺庙、道观苛捐杂税的诏令;13—14 世纪之际蒙古皇室与法兰西皇室之间的外交信函;歌功颂德的铭文,刻在岩石上的赞美爱情的四行诗。此外,还保留下来一些印度的警世恒言、咒语,具有复杂哲学思想的作品、情歌、预言、谚语,及从藏文或汉文译过来的作品。书籍装帧形式有贝叶式、“风琴折叠式”的;手抄体和印刷体,有“袖珍式”的小书,也有大部头的卷书;有普通的木刻版,也有典雅的古版书。这些书籍涉及各种文字形式:有些字母是由近东亚文字派生而来,有些则与印藏字母密切相关。书写形式也各不相同,有些是自上而下书写,有些则是由左向右书写,而单词是在一